

第 一 部

开 始 的 终 结

第一章

开始的终结

我 不打算写另一本有关妇女问题的书。我已经开始一个主要的新问题，它把我远远带离了我以前所关心的事物，为我打开了陌生的大门。我厌倦了妇女运动中的那些实用主义的、追名逐利的争斗，我厌倦了夸夸其谈。我想安享我的余生。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履行着我在职业上和政治上的责任，把我近二十年来都聚焦于妇女运动的个人生活的点点滴滴一一收拾整理起来，但在这个过程中，一种新的、令人不快的紧迫感困扰着我，令我无法离去。通过倾听我自己的儿女和他们的同龄人的谈话，通过在全国及世界各地的大学、专业会议或女权主义工作网络作演讲，我感到在年轻一代人的言论中有什么东西有点不对头，有点捉摸不定，正在误入歧途，他们试图通过这些言论来身体力行那种我们曾为之奋斗的平等。

这些女儿们现在正渐渐长大，她们拚命工作，决心不像

自己的母亲那样受到拘羁；她们抱负远大，视我们必须为之斗争的机会为理所当然——从她们那里，我开始听到痛苦而迷惑的弦外之音，那是一种不适，一种烦扰，一种她们几乎不敢承认的痛苦之情。仿佛有了那些我们为她们赢来、令我们艳羡的机会，她们还怎么能够大声地说出某些问题，谈论某些她们不应忧虑的其他需要——那些塑造了我们生活、使我们陷于困境、我们又起而反对的古老需要？

。在加利福尼亚，在一位深以自己是个“平等机会雇主”为荣的电视制片人的办公室里，我遇到了他的新任“执行助理”。她想在自己的老板进来前与我单独谈了一会儿。她非常可爱，不到三十岁，“为成功而穿着”，打扮得就像最近一期《时尚》杂志中的模特儿。她不是那种只有迷人的工作头衔却永无出头之日的令人赏心悦目的秘书。她取而代之的那位妇女刚刚被提升到“富有创意的副总裁”位置上。

“我知道，我得到这份工作非常幸运，”她说，口气中既有戒备又有责难，“可你们这些为此奋斗的人都有自己的家庭。你已经有了自己的男人和孩子。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她抱怨那个年长的女副总裁，她是位早期的激进女权主义者，曾发誓永不结婚生子，对这个执行助理的无所适从很不理解。“她所想的，”执行助理说，“就是在公司中平步青云。”

。一位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三年级女生对我说：“我要当一名外科医生。我永远也不会像我母亲那样陷在家庭主妇的身份里不能自拔。可我想，我还是愿意结婚生子的。人们

说我们能够兼而有之。可怎样才能做到？我要在医院工作三十六个小时，才会有十二小时的休息时间。用这样的时间，我怎么能够拥有一种两性关系？更别说孩子了。我拿不准自己会不会成为一个女强人。一想到我也许是在拿自己开玩笑，我就不由心惊肉跳。也许我不能兼而有之。我要么不能拥有让我梦寐以求的婚姻，要么不能拥有令我心驰神往的医疗工作。”

• 在纽约，一位刚刚得到提拔的三十来岁的妇女说：“你也许会说，我是在向生物钟挑战。如果我现在不要孩子，就会太迟了。但这是个让人心烦意乱的选择。我一直在供我的丈夫攻读博士学位。我们不知道他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在我们公司，丢下工作去生孩子是没有薪水的。他们也不能保证你能重新得到你原来的工作。如果我不要孩子，我是否会错过生活中的某些东西？作为一个女人，我真的能够得到满足吗？”

在伊利诺斯州举行的一次全国政治会议上，我们重又投身于争取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无尽战斗，仍试图翻越重重障碍。在这里，我也感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困惑，一种挫折感，最终，竟致感到一种战斗力的疲惫。始终精神饱满地为平等权利修正案这样的斗争而战是非常困难的，而按照民意测验以及竞选官员和政党向大众的承诺，平等权利修正案早就应该获准通过了。毫不倦怠地为争取妇女的选择权而战也是非常困难的，这些权利包括妇女有权决定什么时候要

孩子、是否要孩子以及要几个孩子，因而有权在堕胎时得到安全、合法的医疗救助。我们在八年前赢得了这一权利，据最高法院的裁定，与为男人所有、受男人所治、为男人所享的宪法和平等权利法案所保证的许多权利相比，妇女的这一权利更为根本——结果，我们还是要为这一权利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战斗，直到最高法院在 1980 年把它从贫穷妇女的手上剥夺掉。

我感到，我们自以为业已赢得的其他胜利果实也正在化为镜中花水中影；我看到我们自以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又露出了新的峥嵘头角。例如，我们赢得了禁止在工作和教育领域实行性别歧视的法规，赢得了赞助性行动计划和共同起诉案，使妇女有机会得到那些以前只为男人所把持的专门职业和行政工作。然而，在妇女运动进行了十五年后，男女收入的差距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大，平均下来，如果一个男人能挣一美元，一个女人就只能挣到五十九美分；如今，一个中途退学的普通男性高中生要比一个女大学毕业生一年多挣一千六百多美元。这些年来，妇女以前所未有的数字进入劳动大军，但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仍然挤在历来只限于妇女来做的收入菲薄的服务机构和文秘工作中。（随着离婚率超过了 50%，调查表明，离婚男人中有 78% 的人现在正在工作，而相比之下，离婚妇女中只有 71% 的人有工作；而且妇女必须接受那些男人不屑一顾的工作。）

在 80 年代，促使妇女继续工作的不仅是新的渴望，通货膨胀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而失业率已高达 7.8%。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把妇女推向更坏的境地？“灰

心丧气的工人”增至数百万，他们不被算在失业人数之内，因为他们已不再寻找工作。据 1980 年的报道，这些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妇女。

事情越来越清楚，由于与 80 年代基本的生存问题相冲突或相会合，争取平等的妇女运动的伟大里程将被迫中止，或者以某种方式发生改变。在富裕年代最后的轻松岁月中，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走向衰落之时，我们同时还面临着 10% 的通货膨胀、7.8% 的失业率、国内的核事故、左右两翼发起的具有舞台效果的恐怖活动，难道此时的女权主义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奢侈品，一个我们能够随意玩弄的自由的或激进的概念，或是某种我们在面对严酷的经济现实和全国生存现实时必须弃之不顾的东西？难道平等本身正在成为人类基本生存中的一个问题？

我回到家乡伊利诺斯，去参加母亲节这一天在芝加哥举行的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十万人大游行，并与我在皮奥里亚的亲朋好友们取得了联系，我是生在那里、长在那里的。四十年来，规模巨大的履带拖拉机厂第一次大规模裁员，在这一阴影的笼罩下，大街上空寂无人。在一位头发染成红色的上了年级的女营业员的帮助下，我买了一条白色的裙装，打算于最后一次在斯普林菲尔德的游说努力中穿上它。那位营业员搞不懂，为什么共和党州长和民主党总统都信誓旦旦地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可它还是得不到批准。“我再也不会投票给一个在平等权利修正案问题上欺骗我的男人了。”她说，“我别无选择。现在我得自己靠自己，我有

四个女儿要养活。这是个生存问题。”她和我回忆起了我们的童年时代，那是在大萧条期间的皮奥里亚，那时的已婚妇女连教师这样的工作也不许干，即使干了，也干不长久。

数月以来，游说活动从未停止过：这样的女营业员们在游说；从皮奥里亚这样的城镇、从芝加哥及其郊区来的教师和家庭主妇们在游说；在林肯塑像的凝视下，露营在州议会大厦脚下的拖车式活动房屋中的修女们在游说；穿西装戴礼帽夹公文包的女经理们在游说；身着夏装脚蹬无带浅口轻便鞋的工会成员和青年女子联盟地方分会的成员们在游说。其他州的全国妇女组织的骨干成员在前所未有的良好组织下大量拥入。电报、明信片 and 请愿书雪片般飞来。尽管如此，1980年6月，伊利诺斯州议会还是拒绝了批准平等权利修正案。

那一天的报纸上充斥着迈阿密的黑色暴乱、意大利的恐怖爆炸之类的新闻。“我们怎样表达我们的愤怒？”说话的人是一位总是兴高采烈的母亲、我家乡所在城镇的全国妇女组织领导人，她长得就像是某个饼干广告中的人物。“我不能想像我们扔炸弹的情形——现在还不。”

同一个月，在我现在居住的纽约州，一项所谓的“公平合理”的离婚改革法规得以通过。根据这条法规，一个当了多年家庭主妇的妇女，或者一个挣钱没有丈夫多的妇女，将不得不付钱给律师、财产评估员和会计们，十数次地“证明”她在自己的婚姻中做出了“平等”的贡献。她必须用经济手段来证明这一点，以便离婚时，能在结婚期间积聚起来的所

有财产或其他资产中分一杯羹，哪怕房子本在她的名下，也要拿出来分割。“妇女解放论者”的夸夸其谈被用来证明，只给予这样一位离婚的妻子一份“赡养费”是合理的，至于汽车，在一两年的“名誉恢复期”过后就会被剥夺使用权，也不管她也许一直都是个家庭主妇，不管她也许没有能力挣钱餬口，不管她的工作多么不稳定。议员们根本无视统计数字所揭示的情况：1979年，有八百万个家庭是女性当家，比1970年以来增加了46%，其中一半的家庭要靠不到一万元的年收入过活，三分之一的家庭年收入还不到七千元。

按照有类似的离婚法规的其他各州的先例，只要平等权利修正案得不到通过，我所在州的法院就会按二八开或三七开的思路分割婚姻财产，受惠的是丈夫一方。这项议案的主要支持者是律师——包括女律师——他们将从中大捞一把。两位曾驱车送我到奥尔巴尼的全国妇女组织成员正在做出徒劳无益的努力，试图阻止这项法规的通过。她们本人都一直是家庭主妇，一个在结婚二十年后离婚，一个在结婚二十八年后离婚。其中一个好容易找到份文秘工作，最近已被解雇，她现在担心的是会失去自己的房子。另一个曾放弃她自己的会计职业，在当家庭主妇的那些年里一直给自己当会计师的丈夫帮忙，现在她回过头来再自己当会计，一年可挣二万一千美元，而相比之下，她丈夫的年收入是二十五万美元。

就在同一时期，我接到一个电话，邀请我在一次“反色情作品大游行”活动中演讲，这次活动被媒体标榜为女权主

义新的前沿阵地。我听到自己厉声说：“我要离开这个城市了。”对妇女们来说，当她们的经济生存正处在危急关头之际，却把精力浪费在反对色情作品或者其他任何性问题上，似乎是离题万里、误入歧途的。

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自己在妇女论坛（这是个与男生的老同学关系网相对应的“新女孩”关系网）每月一次的午餐会进行到一半时溜了出去，根本无法耐心听完另一位公司大亨就妇女如何在主管职位上获得“真正的权力”提出的忠告。难道这就是妇女运动的全部内容吗？

一些妇女已经冲出重围，干上了主管工作，欣欣然地为职业平等和政治平等装点门面。即使在她们的“新女孩”关系网中，我仍能感到，“女强人”的兴奋感正让位于某种疲惫感，某种动辄产生的失望感，某种对“自信心确立训练法”和权力回报的幻灭感。拉德克利夫学院大权在握的校长马提那·赫奈称这种状况为“自信心危机”。

俄亥俄州的一位老年妇女深思道：“我是这里的第一位女主管。我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冲进以前女人从未涉足过的领域，开始时确实激动人心。可现在它只是份工作。它带来的令人绝望的孤独感才是最糟的。我不能忍受每天孤孤单单地回到那所公寓。我想要一所房子，也许还要一个花园。也许我应该要一个孩子，哪怕他没有父亲。这样一来，至少我有了一个家。一定有某种更好的生活方式。一个女人孤孤单单……”

① 自信心确立训练法 (assertiveness training)，一种以敢作敢为的方式训练胆小畏怯者使之确立自信心的方法。

一位在芝加哥一家银行工作的妇女说：“现在，我丈夫对孩子担负的责任比我要多。饭也全由他来做。我并不觉得内疚。我只是为不能更多地见到孩子们感到难过。一份工作不是终点。拉里过去挣的钱比我挣的多多了，可他恨自己干的事。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切总得靠他。得到我这份工作令人激动。难就难在，当你发现它只是份工作，你真的不喜欢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时，还得留下来。”

我的母校史密斯学院是女权主义的策源地，1980年8月，史密斯学院举办了一期为时三周的管理培训班，培训班的合作者都是些像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大企业，学员则是些“青云直上的”妇女，课程的紧张强度让人难以忍受。参加这一培训班的妇女声称，她们“不需要自信心确立训练——也能向权力进军”。这是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位女主管的发言摘要（《纽约时报》8月18日）。“我们中没有人受到过性别歧视。”另一位妇女说。这些妇女几乎不约而同地拒绝考虑“妇女问题”这样的“软性事务”，认为在家庭和办公室两者间“作出多种承诺”是在“浪费时间”。从清晨到深夜，她们狂热地学习着公司的财政、市场、统计以及诸如阅读一份资产负债表之类的其他“艰难而实用的技艺”。只有一位受到过心理学训练的参与性观察者^①称这些妇女是在练习“矢口否认”的本领。

我在《纽约时报》“女性”专栏中读到这样一件事：我所熟悉的一位雄心勃勃的女记者、一位狂热的女权主义者，由

参与性观察者(participant-observer)，通过亲自参加被研究群体的生活来进行观察研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等。

于某些神秘的关节疾病被迫卧床六个月，这种病与她相当极端的“工作狂”强迫症也许有关，也许无关。可当一个“工作狂”女友加邻居“忙得”无法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帮她买一加仑牛奶时，就连她也感到震惊起来。现在，她指责女权主义使妇女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关怀”品质——既有对男人和孩子的关怀，也有对妇女的关怀。最近有报道说，在年轻妇女中，肺癌和心脏病的发病率在全国范围内急剧增加，令人深感不祥。也有人把这归咎于妇女运动。

不用说，多年来，妇女运动一直是那些受到威胁、担惊受怕的家庭主妇们泄愤的替罪羊，因为她们再也不能指望丈夫供养自己终身。最近，我听到不少年轻妇女，甚至还有一些年长的女权主义者信以为真地指责妇女运动增加了男人的性无能，指责妇女运动使“新型妇女”得不到够格的男人。一些人甚至认为，近年来强奸、“受虐妻子”、“受虐儿童”以及家庭暴力的激增，都是对女权主义的一种反动，或者是女权主义的副产品。

妇女运动受到的最大指责是它对家庭的破坏。宗教人士和社会学家们声称，随着离婚率的提高和单亲家庭及独居者（特别是妇女）的迅速增长，传统定义上的美国家庭正在成为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妇女们放弃了她们对家庭的古老责任，这也被指责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代人遇事冷漠、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

我们能够继续满不在乎地把这一切都看做是敌人的煽动，说这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吗？我认为，我们至少必须承认，女权主义者否认了家庭的重要性，否认了妇女自

身对付出并获得爱及有益于身心的、温情款款的关怀的需要；我们还必须开始公开讨论这些问题。

一些年轻的和不那么年轻的妇女开始违反生物钟规律，在三十五岁、三十六岁、三十九岁、四十岁还不能“选择”要一个孩子，此时她们所面对——或否认——的令人烦恼的矛盾冲突，是如今最令我担心的问题。我曾为选择的权力战斗过，而且还会继续捍卫这一权利，抗击那些反动势力。反动势力现在已经通过否决堕胎的医疗补助的方式，从贫穷的妇女手中剥夺了选择的权力，他们还想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来剥夺全体妇女手中的这一权利。不过，我认为，我们必须从一种新的思路出发，开始讨论选择要孩子的问题。

如今令我担心的是，据称妇女已经赢得了“选择”权，可这些“选择”只是一纸空文。当一位妇女的收入需要用来支付房租或抵押贷款时，当她的工作与照料孩子相互冲突时，当没有一项有关生养假的国家政策时，还有，当她请假去生孩子，却没有人能保证等她回来后还能得到原来的工作时，一位妇女怎么能够自由地“选择”要孩子？

如今令我担心的是，由于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需要，全国有六岁以下孩子的母亲中，目前在外工作的人数超过了45%，相比之下，1960年只有10%。（而且，按照福特基金会的研究估计，到1990年，只有四分之一的母亲会全天留在家中。然而，政府、公司、工会、民主党或共和党——甚至妇女运动本身，却没有在幼儿看护服务方面做出任何必要的、全国性的努力。

另一个令人困扰的信号是：当卡特总统提议象征召男

人那样征召年轻妇女入伍时，很显然，除了一般的美国中年人之外，大多数年轻妇女以及许多年纪较大的女权主义者，也反对这样一项针对妇女的草案。菲利斯·施拉弗莱当然会揪住这个草案不放，以便向平等权利修正案发起新一轮的疯狂反扑。而我接到许多年轻妇女从全国各地打来的长途电话，为一项她们不想要的草案而指责妇女运动。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必须意味着平等的责任——这一女权主义的公理有什么后果？妇女运动真的意味着妇女也有同等的机会向另一个越南发射导弹吗？

我回想起十年妇女运动在初始阶段的蓬勃兴起——1970年8月26日，成千上万的妇女在第五大街游行示威，那是妇女为争取平等而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罢工，游行队伍中，人们打出了这样的标语：“工作和教育的平等权利”；“堕胎的权利”；“二十四小时幼儿看护”；“妇女的政治权力”——在那时，我们的议事日程看上去是那么简单而直接。

但在1980年8月26日，为争取平等而进行的无休无止、永无终结的现实斗争使妇女运动精疲力竭，以至于不能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象征性游行。在伊利诺斯州，全国妇女组织的领导人第八次争取平等权利修正案得到批准的努力又告失败，弄得她们身心俱疲。1980年母亲节这一天，在芝加哥举行了将近十万人的示威游行，在这些冷漠的日子中激起一股热情，其规模比任何总统候选人所能召集起的集会都要大得多，但它也未使伊利诺斯州议会产生丝毫动摇。

妇女的政治权力？我们说：“制定政策，不煮咖啡。”于

1971 年组织起全国妇女政治决策会议，目的是让妇女竞选公职，在全国代表大会中占有议员席位，在政治进程中，代表我们这些占全国人口 52% 的人发言。

于是，1980 年，妇女们在底特律发起了惟一一次反对共和党大会右翼控制势力的战斗，男人积极参与其中。他们徒劳地抗议共和党在其纲领中拒不接受他们为之努力奋斗了半个世纪的平等权利修正案。反之，共和党人则发誓，只提名那些将会把堕胎判为谋杀的人担任法官。那么，共和党的妇女是与里根一刀两断，还是双唇紧闭，投票反对作为妇女的她们自己的利益？毕竟，在一位民主党总统的任期内，只有一个州批准了平等权利修正案，而当政府基金向需要堕胎的贫穷妇女紧闭大门时，那位总统也只说了一句：“生活是不公平的。”

1980 年，民主党代表大会中有 49% 的代表由妇女组成，她们不顾卡特班底的强硬态度和肯尼迪的冷漠，把一项令他们感到极不舒服的条款列入了民主党纲领之中，即禁止向任何一个对平等权利修正案不作出承诺的民主党候选人提供金钱或技术上的支持。经过压倒多数的唱名投票，大会声言支持各个收入水平的妇女的选择权利，其中包括向需要堕胎的贫困妇女提供政府帮助。卡特会据此进行竞选吗？没有，但至少妇女已经成功地把两党中那些看不见的敌人从反对的阴影中拉了出来，使之羞愧脸红，并使平等权利修正案、妇女在生育方面的各项选择权及堕胎权等主要问题在总统竞选过程中得到了批准。

我们是否应该支持这样一些妇女：在妇女运动的促动

下，她们被选人国会或市政会议，或在白宫及接近内阁水平的位置上得到提名，却在妇女们于民主党大会议席上进行的那场令人欢欣鼓舞的、史无前例的斗争中，受到别人的操纵，成为男性政治集团的有意识的代言人，试图让我们放弃或收回女权主义者的锋芒？在凌晨三点的一次会议中，因于最高法院判决之前坚决支持具有历史意义的堕胎诉讼而名声鹊起的撒拉·威丁顿，徒劳地想让妇女联合阵线向她的白宫老板低头，接受他在平等权利修正案和堕胎问题上的退缩行为。全国妇女组织备受攻讦的主席埃莉诺·斯密尔对我说：“你不能指望任何女人在得到一点权力后，不出卖其他妇女。”

即使在妇女运动内部，也有一些与权力有关的新问题应该加以面对。女权主义者联盟在民主党大会议席上大放光芒的那一刻之前和之后，妇女运动一些组织的领导人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彼此争权夺利，骗取金钱和权力以支撑自己的组织班底，她们在这上面耗费的精力，与她们花在平等权利修正案和堕胎问题上的精力一样多。

有些问题是我和其他一些女权主义领导人共同担忧的。弗朗伦斯·霍韦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在这十来年中，她一直在领导争取妇女学科的斗争，她对女议员们那样立场坚定地反对卡特班底成员感到吃惊。“我们斗争就是为了进入主流。一旦到达主流，谁还想冒险退出？我承认，现在，在妇女学科这一贫瘠领域内，我觉得孤立无援。作为我这一领域的一部分，我没有体验到应有的兴奋感。”

“也许妇女运动现在就是主流。”贝拉·阿伯佐格说。由

于她试图利用妇女对她的拥护进入参议院并当选纽约市市长，从而失去了她在国会中十拿九稳能够获得的席位。当她坚持认为通货膨胀、失业和财政赤字都是妇女问题时，她又失去了总统妇女顾问委员会主席之职。现在，她正试图在现行女权主义或政治组织的框架之外，开创一个新的妇女权力基地。有那么一段时间，她重又因权力在身而光彩夺目，在民主党大会上牛刀小试，安排妇女组织委员会议席资格的运作。

但在 1980 年 8 月 26 日，只有五百个人得到证实参加了第五大街的游行。对于成千上万的妇女们来说，十年前这样一场游行示威是女权主义觉悟的锋芒所在，可她们现在却心有旁骛。几个妇女把自己锁在位于华盛顿的共和党全国总部外的栅栏上。卡特总统在白宫签署了一项公告，纽约市长库奇在宣布“妇女平等周”的同时，又说他不会受到那个由妇女写进政党纲领中的条款的制约。我留在长岛的家中，和我的邻居、朋友及我们的女儿们到市镇公用绿地进行了游行，纪念我们自己的历史。但想让历史重演显然是一个错误。

有些战斗我们赢了，可到头来还得重新投入战斗；有些战斗按照所有的规则而言，早就应该赢得胜利，却还没有取胜；有的战斗突然间没有人真的想赢。这种种战斗分别带给人的不适感以及所有战斗共同带给人的疲惫感——有多少妇女感觉到了？妇女运动中的这些不安，这种到处都是敌人和危险的感觉，都意味着什么？那些不存在的假想敌，看不